

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提升路径研究

裴 然¹, 侯冠宇²

(1. 哈尔滨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2. 中国政法大学 商学院, 北京 100088)

摘 要: 构建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发展指标, 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分析各要素间的协同关系。研究发现, 政府关怀与效率、信用环境、市场公平性和开放程度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 政府引导型和市场驱动型路径发挥重要作用; 进一步分析发现, 东部地区在市场竞争、创新能力和政府效率上具有较强优势, 中部地区则在公共资源供给、信用环境和市场公平表现突出; 西部地区则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 不断提升开放程度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营商环境; 数字经济; 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格局; 市场驱动

中图分类号: F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92X(2023)11-0023-05

The 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Paths for Enhancement

PEI Ran¹, HOU Guan-yu²

(1. School of Marxism,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indicators for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utilizing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s among various factor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government care and efficiency, credit environment, market fairness, and openness are key factors propelling the growth of the digital economy. Both government-guided and market-driven paths play significant roles.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eastern region boasts advantages in market competition,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government efficiency. The central region stands out in public resource supply, credit environment, and market fairness. Under strong government support, the western region continually enhances its openness,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 Business environment; Digital economy;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Market driven

一、引言

在数字化技术不断崭露头角的时代背景下, 数字经济的崛起已逐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 对各国的经济发展布局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 营商环境的角色日益凸显, 在塑造国家及地区经济竞争力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并涉及政府效率、市场公平和信用环境等多重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要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 优化营商环境。尽管已有研究在数字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

展, 但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其动力机制的深度探索仍显不足。鉴于此, 揭示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联及其驱动路径的机制, 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 首先, 基于系统理论, 构建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发展体系, 为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其次, 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对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进行探讨。再次, 揭示营商环境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驱动路径以及区域发展特性。最后, 为政府部门和企业界提供了营商环境优化的策略建议, 旨在推动数字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2BJL007)。

作者简介: 裴然, 教授, 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研究方向: 政治经济学; 侯冠宇 (通讯作者),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政治经济学。

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而提升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竞争力。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1. 文献综述

在数字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的研究领域，学界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如下两方面：一是营商环境的定义及其构成元素的理解。世界银行在《营商环境报告》中定义营商环境为企业在进行创业、经营等活动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总和^[1]。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一种区域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内，企业的行为受到政府、金融机构、公共服务机构等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营商环境的构成要素包括政府的支持和效率、公共资源供应、信用环境、法治环境、市场公平性、开放程度等多个方面^[2]。张邦辉、李琴(2023)厘清营商环境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以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3]。二是数字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的关系及影响因素研究^[4]。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法治环境的完善是驱动数字产业发展的核心因素^[5]。提高政府立法质量对于完善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具有重要作用^[6]。良好的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促进作用，这包括政府对数字产业的扶持^[7]、税收优惠以及对企业的法律保护等政策措施^[8]，多项政策措施可以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9]，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10]，增强环境承载力，从而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11]。

综上，已有研究分析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已有研究更多关注单一要素的定量分析，较少分析系统内诸多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进而对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整体性、协同性和动态性的理解还不够充分^[12]。二是已有研究主要关注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之间的线性关系，较少涉及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影响。三是营商环境如何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讨论在现有研究中较为欠缺。鉴于不同地区的营商环境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如何充分挖掘和发挥各地区的特色和优势，以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 理论基础

目前，已有研究主要局限于单一或线性的关系分析，鲜有学者从组态视角出发，将我国各省份作为具体参考对象，分析营商环境如何以多元化、互动式的方式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此，文章构建了一个多元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包括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互联网相关产出、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等核心指标。同时也构建了一个包含多个维度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从政府角色、社会环境、市场环境三个一级维度出发，细分为政府关怀、政府能力、公共资源供给、社会信用、法治环境、市场竞争公平、市场开放程度七个二级指标^[13]。由于营商环境的各要素与数字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此种关系不仅表现在单一要素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上，更表现在诸多要素之间的共生、竞争及其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共同影响方面。基于组态视角构建的理论模型能够更全面、深入地揭示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机制。

三、研究方法

1. 方法选择

本研究选取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

parative Analysis, fsQCA)方法，以剖析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复杂影响机制。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由美国社会学家 Charles Ragin 发展而来，这一方法的应用越过了传统定性定量研究的划定界限，特别适用于处理中等样本的复杂问题。故使用该方法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我国各省份的样本数量介于大规模样本和小规模样本之间，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视为连续性变量，能够有效地解决并发性、非对称性、多重等效性等传统方法难以克服的问题。第二，这一方法的应用有助于揭示特定地区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因果关系，能打开因果关系的“黑匣子”，提炼各地区可推广的发展策略。

2. 样本和数据

本研究以中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作为研究样本。基于赵涛等(2020)研究，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考虑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互联网相关产出、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14]。基于侯冠宇(2023)研究，营商环境的评价指标包括：政府关怀、政府效率、公共资源供给、融资信用、法治建设、市场公平及市场开放程度这七个核心方面。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营商报告》等。考虑到此种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借鉴 Zhang 等(2020)^[15]和苏屹等(2017)^[16]的研究方法，具体构建的指标体系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表 1 结果变量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互联网普及率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	+
	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	+
	互联网相关产出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
	移动互联网用户数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表 2 条件变量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内容与计算公式
政府角色	政府关怀	政府对企业关心指数
	政府能力	电子服务能力指数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GDP
社会环境	公共资源供给	水电、交通、人力资本、互联网人均使用数量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GDP
	社会信用	商业纠纷/企业数
法治环境	法治环境	司法文明指数、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数/专利数、万人刑事案件、律师数量/企业数和中国司法透明指数
	市场竞争公平	商标注册数/人口数 私营企业法人单位数占企业法人数
市场环境	市场开放程度	海关进出口额/GDP 外资直接投资企业数/企业数 对外非金融投资/GDP

3. 测量和校准

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均被视为独立集合。这些集合都以一定的隶属分数存在于每个样本案例中。首先，依据各个地区的具体发展情况，对所有变量的取值分布进行测量统计，设定每个变量的三个“锚点”，即“完全隶属”“交叉点”及“完全不隶属”。并将每一个校准点对应设定为样本数据在 95%、50% 和 5%的分位数^[17]，展现出各变量在样本集合中的实际分布情况，增强模型的准确性和信度，校准结果如表 3 所示。

四、实证分析

1.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从一致性和覆盖率两方面对单一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是否

表 3 结果变量和条件变量的校准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结果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Y	0.6	0.2	0.1
条件变量	政府角色	X1 政府关怀	89	52	14
		X2 政府效率	90	72	40
		X3 公共资源供给	66	49	33
	社会环境	X4 信用环境	87	66	38
		X5 法治环境	64	43	22
	市场环境	X6 市场公平	64	38	19
		X7 开放程度	49	9	2

可以构成充分或必要条件进行测度。基于 QCA 3.0 软件，借鉴王婉等(2022)^[18]、侯冠宇和熊金武(2023)^[19]的做法，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对单变量缺少状况（带~符号）的结果同样进行检验。根据表 4 可知，单一变量的一致性指标均小于构成必要条件的临界值 0.9，可见营商环境的单一变量无法有效解释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2.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表 5 中呈现的是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中的七个条件变量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组态分析结果。分析结果揭示，推动我国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至高水平的途径存在四条有效组态路径。具体来说，政府的关心和有效行政管理、良好的信用环境以及市场的公平性与开放程度在营商环境中被视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本研究中的条件组态覆盖了 54% 的样本空间，而总体的一致性达到了 90%。同时，各单条路径的一致性与总体一致性均高于 0.89，说明这四条路径在当前营商环境中发挥着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策略作用。

(1) 高组态结果分析

组态 H1 的一致性为 0.95，原始覆盖度为 0.29，能够解释 29% 的样本案例。核心因素为政府效率与信用环境，辅助因素为公共资源供给、法治环境与市场公平，典型案例为江苏省。在这一组态中，政府效率主要体现在政府决策的高效执行、行政审批的简化及优化政策制定，这些措施对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量、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信用环境强调的是建立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对互联网普及率、相关电信业务总量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公共资源供给、法治环境和市场公平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互联网普及率和相关电信业务总量的提升。整体而言，组态 H1 强调政府效率与信用环境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核心作用。

表 4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检验结果

变量	变量说明	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非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X1	高政府关怀	0.735808	0.705021	0.613776	0.695955
~X1	低政府关怀	0.682678	0.598978	0.739852	0.768199
X2	高政府效率	0.743814	0.714685	0.549200	0.624476
~X2	低政府效率	0.609170	0.533121	0.749077	0.775796
X3	高公共资源供给	0.732897	0.694004	0.614391	0.688491
~X3	低公共资源供给	0.671034	0.595223	0.726937	0.763073
X4	高信用环境	0.772926	0.726899	0.614391	0.683778
~X4	低信用环境	0.663756	0.592593	0.754613	0.797271
X5	高法治环境	0.754731	0.692256	0.559040	0.606809
~X5	低法治环境	0.571325	0.522636	0.716482	0.775633
X6	高市场公平	0.819505	0.761840	0.576876	0.634641
~X6	低市场公平	0.606987	0.547963	0.783518	0.837056
X7	高开放程度	0.839156	0.801808	0.516605	0.584145
~X7	低开放程度	0.564774	0.496799	0.824723	0.858515

注：此处一致性与覆盖度分别保留 6 位小数。

组态 H2 的一致性为 0.90，原始覆盖度为 0.37，能够解释 37% 的样本案例。核心因素为政府角色、信用环境和市场环境，典型案例为浙江省。在这一组态中，政府角色主要体现在政府对数字经济的引导与支持，如提供税收优惠、资金扶持以及人才培养等政策的实施对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量、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信用环境在此组态中依然是核心因素之一，通过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对互联网普及率、相关电信业务总量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市场环境在这一组态中成为关键因素，包括市场准入、市场竞争以及市场监管等，诸多因素共同促进了互联网普及率、相关电信业务总量、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提升。整体而言，组态 H2 凸显了政府角色、信用环境和市场环境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与组态 H1 相比，H2 更注重政府对数字经济的引导与支持，以及市场环境的优化。

组态 H3 的一致性为 0.94，原始覆盖度为 0.40，能够解释 40% 的样本案例。核心因素为政府角色、市场环境与信用环境，典型案例为北京市。在这一组态中，政府角色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支持，如加大对科研项目的投入、鼓励技术研发以及引导企业加强产学研合作，这些措施对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量、相关电信业务总量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市场环境在组态 H3 中依然是关键因素，特别强调市场开放与竞争，包括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维护市场秩序以及鼓励跨行业合作等措施，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互联网普及率、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提升。信用环

表 5 组态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非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H1	H2	H3	H4	L1	L2	L3	L4	L5	L6	L7	
政府角色	X1 政府关怀	□	★	★	★	□	□	□	●	●	●	●
	X2 政府效率	★	★	★		□	●	□	●	□	□	□
社会环境	X3 公共资源供给	●	●		●	○	○	○	★	★	○	○
	X4 信用环境	★	★	★	★	●	□	□	●	●	□	□
	X5 法治环境	●		●	●	□	□	●	□	□	●	●
市场环境	X6 市场公平	●	★	★	★		□	□	□	□	□	●
	X7 开放程度		★	★	★	○	○	○	○	○	○	○
一致性		0.95	0.90	0.94	0.89	0.99	0.99	0.99	0.99	0.99	0.99	0.99
原始覆盖度		0.29	0.37	0.40	0.36	0.31	0.27	0.28	0.26	0.22	0.23	0.21
唯一覆盖度		0.04	0.05	0.08	0.03	0.05	0.02	0.07	0.02	0.01	0.04	0.02
总覆盖度		0.54				0.59						
总一致性		0.90				0.99						

注：其中★表示核心条件，●表示辅助条件，○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辅助条件缺失，空格表示该条件既可以存在也可以缺失，不影响路径的准确性，下同。

境在此组态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完善信用评价体系,促进互联网普及率和相关电信业务总量的增长。整体而言,组态 H3 强调了政府角色、市场环境 with 信用环境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与组态 H2 相比, H3 更关注政府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支持以及市场开放与竞争的促进。

组态 H4 的一致性为 0.89,原始覆盖度为 0.36,能够解释 36%的样本案例。核心因素为市场环境、信用环境与政府关怀,典型案例为广东省。在这一组态中,市场环境侧重于市场准入的便利化、市场竞争的促进以及营商环境的优化,这些措施对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量、相关电信业务总量、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信用环境在组态 H4 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健全信用评价体系,推动互联网普及率和相关电信业务总量的增长。政府关怀在此组态中成为新的核心因素,主要体现在政府对企业 and 个人的关注,如提供创业扶持、关注民生问题以及保障信息安全等政策对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量、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积极作用。整体来看,组态 H4 强调了市场环境、信用环境与政府关怀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核心地位。与前述组态相比, H4 更注重政府对企业 and 个人的关怀,以及市场环境的优化,从而实现数字经济的全面发展。

(2) 低组态结果分析

低组态路径共有七条,总一致性为 0.99,总覆盖度为 0.59,能够解释 59%的样本案例。通过对比发现开放程度不足是形成低组态的主要原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低组态地区的营商环境水平较低,或者这些地区在数字经济构成要素方面的发展程度较低。实际上,低组态反映的是营商环境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过程中的引领作用不足,以及在具体路径中存在障碍和阻塞。

(3) 高低组态路径总结分析

通过对比营商环境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高组态与低组态,发现低组态并不是高组态的简单对立面。事实上,低组态并不意味着营商环境或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是揭示了营商环境在引领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潜在短板。这表明在政府政策、市场准入、信用体系等方面,仍需注重以提升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进一步总结出两条主要的驱动路径。第一条是政府引导型路径(H1和H3),该路径强调政府效率和政策支持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作用。第二条是市场驱动型路径(H2和H4),该路径强调市场公平与开放程度,通过促进市场竞争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总之,地方政府应根据所处的高组态类型和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政策措施,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实现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政府引导型路径中,政府需发挥主导作用,加强政策支持,提升效率;而在市场驱动型路径中,应关注市场环境的优化,促进公平竞争,激发市场活力。

第一,政府引导型路径(H1和H3)。在政府引导型路径中,政府在营商环境的优化上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法规,提供财政支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

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以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北京市以打造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六个高地”为主要目标,从政府角度提高互联网普及率和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北京市高标准建设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参与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汇聚国际数据资源,探索数据交易规则、技术实现路径和商业模式,提供面向全球的数据价值发现、数据资产交易服务。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和运行规则,优化市场环境,打破制约创新的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从而推动社会环境的改善。

第二,市场驱动型路径(H2和H4)。在市场驱动型路径中,关键在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保障市场竞争公平,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企业参与数字经济。此外,还要鼓励企业创新和创业,为企业提供便利的政策和服务,以提高市场活力,推动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具体来看,浙江省已在2017年将数字经济列为“一号工程”,着力于优化市场环境,提高互联网普及率和相关从业人员数。在数字产业化方面,浙江省开辟出一条以商业模式创新培育领先市场,驱动数字技术突出的特色道路。浙江省政府将数字化转型作为再优化营商环境新优势的着力点,为个体、企业提供便捷化与个性化服务的同时,因地制宜调整监管策略,清理阻碍发展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营造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进而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3. 替代关系分析

(1) 路径 H1 和路径 H3 对比分析

路径 H1 和路径 H3 都属于政府引导型路径,但在政府作用和重点领域上有所不同。路径 H1 强调政府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支持作用,关注政策制定、法治建设、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在这条路径中,政府主要以制度安排为手段,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鼓励市场竞争,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从而激发市场活力。

路径 H3 则更注重政府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协同作用和资源整合能力。政府在这条路径中,着力于推动不同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互动,通过资源整合、共享和协同发展来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侧重强调政府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协调、组织和合作作用,以及在跨地区、跨部门和跨行业的数字经济发展项目中的推动力。

(2) 路径 H2 和路径 H4 对比分析

路径 H2 和路径 H4 都属于市场驱动型路径,但在市场环境和企业角色上有所不同。路径 H2 关注市场环境的优化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在这条路径中,市场竞争、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政府在此路径中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为企业提供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政策支持。此路径强调市场参与者的主动性,鼓励企业不断创新,实现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路径 H4 则更注重企业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协作和资源整合。这条路径强调企业间的合作和协同发展,通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跨行业的资源整合和技术互补,以及跨区域的产业布局优化等方式,实现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政府在此

路径中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为企业间的合作创造便利条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和产业升级。

4. 异质性分析

根据国家标准将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由于我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在要素禀赋、经济发展程度、开放水平以及制度环境等方面存在异质性,因而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路径存在差异。通过对比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营商环境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组态结果,探究不同地区的差异化提升路径。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存在四条高组态路径。其中东部地区表明,在保证政府效率的情况下,信用环境、市场公平与开放程度的协调联动可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中部地区表明,公共资源供给、信用环境和市场公平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条件,而诸多要素协调联动可以弥补政府关怀不足的情况。西部地区,在政府角色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可以弥补开放程度、信用环境带来的不足,进而助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五、研究结论与现实启示

1. 研究结论

第一,营商环境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起关键作用。政府角色、社会环境、市场环境等单一前因条件无法独立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政府关怀、政府效率、信用环境、市场公平与开放程度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开放程度不足是形成低组态的主要原因。在不同地区和发展阶段,诸多要素通过协同作用,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

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多元化的驱动路径,表现为“非对称性”和“多重并发”的特点。对比分析发现,政府引导型和市场驱动型路径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和侧重点。政府引导型路径侧重于政策扶持、人才培养和基础设施建设;市场驱动型路径强调市场竞争、创新能力和企业自主发展。

第三,研究揭示了不同地区在营商环境推动数字经济上的差异特征。东部地区在市场竞争、创新能力和政府效率方面表现突出;中部地区在公共资源供给、信用环境和市场公平方面具有较强的发展优势;而西部地区在政府支持下,努力弥补开放程度和信用环境方面的不足。

2. 现实启示

第一,强化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政府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起关键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创新能力和竞争中的作用。通过优化政策环境、提升政府效率,同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鼓励企业创新与创业,形成政府与市场协同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

第二,注重培育区域特色与优势。不同地区在数字经济发展上具有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因此,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方面,应充分挖掘各地区特色和优势,以激发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

第三,重视要素协同与多元化驱动路径。数字经济发展存在多种驱动路径,具有“非对称性”和“多重并发”的特点。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关注政府关怀、政府效率、信用

环境、市场公平和开放程度等关键因素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协同作用。同时要灵活采用多种政策组合,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发展阶段的实际需求,从而实现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World Bank Group .Doing business 2019 [R].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 2018.
- [2] 李志军.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 [M].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9 : 212- 279.
- [3] 张邦辉,李琴. 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的营商环境治理研究 [J/OL].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 14[2023- 9- 25].http ://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30904.0816.002.html.
- [4] 董志强,魏下海,汤灿晴. 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 30 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 [J].管理世界 ,2012(4) :9- 20.
- [5] 裴秋亚,范黎波. 营商环境驱动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关系 [J].科技管理研究 ,2023(3) :185- 192.
- [6] 刘权. 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的行政法治化之道 [J].社会科学辑刊 ,2023(2) :57- 67.
- [7] 黎江虹,周坤琳. 数字经济时代营商环境中的“有为政府” [J].学习与实践 ,2023(1) :22- 32.
- [8] 陈亚平. 税收优惠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意愿的效应研究——来自高企认定的证据 [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3(2) :56- 61.
- [9] 孙成己,侯冠宇,张春华.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知识结构与演化路径研究 [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3(9) :86- 91.
- [10] 夏后学,谭清美,白俊红. 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 [J].经济研究 ,2019(4) :84- 98.
- [11] 赵彤彤,焦方义.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与城乡收入差距 [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3(1) :92- 96.
- [12] 侯冠宇. 营商环境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 :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 [J].理论月刊 ,2023(11) :85- 97.
- [13] 侯冠宇. 营商环境对就业的影响与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我国 30 个省份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J].河南社会科学 ,2023(5) :63- 72.
- [14] 赵涛,张智,梁上坤. 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J].管理世界 ,2020(10) :65- 76.
- [15] Zhang M L ,Li B Z ,Yin S. Configurational paths to reg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interplay of innovation elements based on a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approach [J].Technolog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2020(12) :1422- 1435
- [16] 苏屹,安晓丽,王心焕,等. 人力资本投入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门槛回归 [J].科学学研究 ,2017(5) :771- 781.
- [17] 熊金武,侯冠宇.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 :基于动态 QCA 方法的省域实证 [J].统计与决策 ,2023(17) :23- 28.
- [18] 王婉,范志鹏,秦芝根.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测度 [J].统计与决策 ,2022(3) :124- 128.
- [19] 侯冠宇,熊金武.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我国 30 个省份的计量与 QCA 分析 [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3) :89- 99.

(责任编辑: FZF)